

中国诗词曲赋研究丛书

唐诗研究

□ 沈松勤 胡可先 陶然 著

唐诗繁荣的标志 唐诗繁荣的原因 唐诗的演进阶段 唐诗诗体
唐人诗论 唐诗文献 唐诗与政治 唐诗与宗教 唐诗与科举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诗词曲赋研究丛书

唐诗研究

□ 沈松勤 胡可先 陶然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研究 / 沈松勤, 胡可先, 陶然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1

ISBN 7-308-04571-4

I. 唐... II. ①沈... ②胡... ③陶... III. 唐诗—
文学研究 IV. 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813 号

责任编辑 钟仲南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星云光电图文制作工作室

印 刷 杭州东联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4000

书 号 ISBN 7-308-04571-4 / I · 163

定 价 45.00 元

唐诗研究

中

国

诗

词

曲

赋

研

究

丛

书

责任编辑：钟仲南

封面设计： 春天 书装工作室
MOE13051363823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唐诗繁荣的标志	(1)
第二节	唐诗繁荣的原因	(3)
一	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	(4)
二	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	(5)
三	较为开放的思想体系	(7)
四	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	(9)
第三节	唐诗的分期	(11)

第二章 唐诗的演进阶段

第一节	初唐诗歌	(14)
一	贞观前后的诗坛	(14)
二	“四杰”与初唐诗歌	(19)
三	“沈宋”的律诗与陈子昂的“唐音”	(30)
第二节	盛唐诗歌	(35)
一	张九龄与山水田园诗派	(35)
二	高适、岑参与边塞诗	(46)
三	将唐诗推向巅峰的李白与杜甫	(58)
第三节	中唐诗歌	(79)
一	刘长卿、韦应物与“大历十才子”	(80)
二	韩孟诗派与柳宗元、刘禹锡	(86)
三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106)
第四节	晚唐诗歌	(118)

一 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	(119)
二 李商隐与深婉绮丽诗风	(123)
三 “咸通”诗人群与唐末诗风	(132)

第三章 唐诗诗体

第一节 唐诗诗体的形态与演进	(140)
一 唐诗诗体的辨识	(140)
二 唐诗诗体的形态分类	(145)
三 唐诗诗体的演进趋势	(151)
第二节 以时代论诗体	(160)
一 大历体	(160)
二 元和体	(164)
三 长庆体	(168)
第三节 以诗人论诗体	(172)
一 沈宋体	(172)
二 上官体	(176)
三 王杨卢骆体	(179)
四 陈拾遗体	(181)
五 韦柳体	(183)
六 韩孟体	(185)
七 元白体	(186)
八 张王乐府	(189)
九 温李体	(190)
十 姚贾体	(192)
十一 皮陆体	(194)
第四节 以体裁论诗体	(199)
一 古体	(199)
二 近体	(203)
三 杂体	(211)
四 新歌行体	(216)
五 新乐府	(220)

第四章 唐人诗论

第一节 唐人诗论概述	(224)
一 唐人诗论的四种表现形态	(224)
二 唐人诗论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227)
第二节 唐人重要诗论举隅(上)	(234)
一 上官仪的“六对”、“八对”说	(234)
二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236)
三 王昌龄《诗格》	(237)
四 李白的诗论	(242)
五 杜甫的诗论	(245)
第三节 唐人重要诗论举隅(下)	(249)
六 殷璠《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	(249)
七 皎然《诗式》	(254)
八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美刺教化理论	(262)
九 司空图《诗品》	(267)

第五章 唐诗文献

第一节 唐诗文献的种类、流传和散佚	(274)
一 总集种类与源流	(275)
二 别集种类与源流	(281)
三 作家传记资料	(285)
四 敦煌文献	(289)
第二节 唐诗重要别集叙录	(290)
(一)王勃《王子安集》 (二)杨炯《盈川集》 (三)卢照邻《卢昇之集》 (四)骆宾王《骆临海集》 (五)陈子昂《陈伯玉文集》 (六)孟浩然《孟襄阳集》 (七)王维《王右丞集》 (八)高适《高常侍集》 (九)岑参《岑嘉州集》 (十)韦应物《韦苏州集》 (十一)李白《李翰林集》 (十二)杜甫《杜工部集》 (十三)孟郊《孟东野诗集》 (十四)韩愈《昌黎先生集》 (十五)柳宗元《柳宗	

元集》 (十六)李贺《李长吉歌诗》 (十七)白居易《白氏长庆集》 (十八)元稹《元氏长庆集》 (十九)刘禹锡《刘宾客集》 (二十)杜牧《樊川文集》 (二十一)李商隐《玉溪生诗集》 (二十二)温庭筠《温飞卿诗集》 (二十三)皮日休《皮子文藪》 (二十四)韩偓《韩翰林集》 (二十五)韦庄《浣花集》

第三节 唐诗重要总集叙录 (330)

(一)许敬宗等《翰林学士集》 (二)崔融《珠英集》
(三)殷璠《河岳英灵集》 (四)殷璠《丹阳集》 (五)芮挺章《国秀集》 (六)元结《篋中集》 (七)李唐成《玉台后集》 (八)令狐楚《御览诗》 (九)高仲武《中兴间气集》 (十)姚合《极玄集》 (十一)韦庄《又玄集》 (十二)韦毅《才调集》 (十三)佚名《搜玉小集》 (十四)顾陶《唐诗类选》 (十五)胡震亨《唐音统签》 (十六)御定《全唐诗》 (十七)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十八)孙洙《唐诗三百首》

第六章 唐诗与政治

第一节 武周革命与文学环境的变化 (346)

- 一 建立以文章取士制度 (347)
- 二 降低士族威望 (348)
- 三 政治与文学中心的东移 (350)
- 四 《三教珠英》的编纂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 (352)
- 五 从“北门学士”到“珠英学士” (353)
- 六 文化环境从儒学化到文学化 (355)

第二节 安史之乱与唐诗转型 (357)

- 一 文人的爱国之情与书生之气 (358)
- 二 文学重心的多元化 (364)

第三节 永贞革新与元和新变 (372)

第四节 牛李党争:政治漩涡中的文人命运 (376)

第五节 甘露之变与文士全身远祸的心态 (383)

第七章 唐诗与宗教

第一节	唐代三教的调和与对抗	(388)
第二节	唐诗与佛教	(391)
一	佛教对唐诗的影响	(391)
二	唐代僧诗考察	(394)
三	佛教与唐代白话诗派	(396)
四	王维与佛教	(398)
第三节	唐诗与道教	(401)
一	道教对唐诗的影响	(401)
二	三李与道教	(406)
三	游仙诗的繁盛与道教的影响	(415)

第八章 唐诗与科举

第一节	唐代的科举制度	(419)
一	唐代科举考试的流程	(420)
二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	(425)
第二节	进士试与省试诗	(428)
一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	(428)
二	省试诗	(430)
第三节	行卷风气与行卷诗	(434)
一	唐代举子行卷的社会风尚	(435)
二	行卷诗	(443)
第四节	赴举诗、及第诗和落第诗	(447)
一	赴举诗	(447)
二	及第诗	(450)
三	落第诗	(453)
引用书目		(459)
后 记		(468)

第一章 绪 论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了唐代,进入了它的新的的高峰期,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那么,唐诗繁荣的标志是什么?是何种原因带来唐诗的繁荣?唐诗又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节 唐诗繁荣的标志

从公元 618 年高祖李渊受禅于隋,到公元 907 年哀帝李祝禅位于朱全忠,唐代共换了 20 个皇帝,经历了 289 年。在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唐代究竟出现了多少个诗人,他们写有多少首诗歌,而今是无法确切地统计了。据《旧唐书·经籍志》,高宗李治有文集 86 卷,中宗李显有文集 40 卷,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另如才女上官婉儿的文集 20 卷也失传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作品中的很少的部分。其他亡佚的唐诗,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唐诗来看,其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清代康熙年间,彭定时、杨中讷等人据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清初季振宜的《唐诗》等文献,编成《全唐诗》,共 900 卷,收录唐诗 48900 多首,诗人 2200 多家;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由王重民、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人编辑的《全唐诗补编》,又补收了 4300 首,共计 53000 多首。这个数字足以令人称羨。

诚然,如此可观的数量,不失为唐诗繁荣的一个标志,但唐诗之所以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居于显赫地位,恐怕不完全在于数量。如果纯粹以数量论,唐诗虽然比西周到南北朝 1600 多年间保存下来的诗歌多出三倍以上,但与宋诗相比,其数量上就无优势可言了。据已出版的《全宋诗》,收录作者 9227 人,作品数量是唐诗的五倍还多。至于诗歌“中兴”的清代,目前虽然无法统计诗人与诗歌数量,但仅《晚晴簃诗汇》一书,就已收录了 6100 多位诗人的诗歌,而现存的清诗专集,当不下于 4000 种。清诗的数量不是以万计,而是以数十万计,是无可置疑的。

倘若从诗歌的质地着眼,我们就会看到,唐诗不仅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更重要的是在这支队伍中,名家辈出,巨匠迭现。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固不待言,即如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也都取得了为后人所仰慕的杰出成就,他们的诗歌,无论是体质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抑或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将中国古代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与此同时,在唐代,不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童子、妇人都加盟诗歌创作的队伍,而且众体兼备,风格多样,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说的那样:“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缙流、羽客,靡弗预矣。”^①这段话从诗人队伍、诗歌风格和诗歌体裁三个方面,总结了唐诗繁荣的具体标志。尤其是众体兼备这一点,可以纠正由焦循、王国维等人造成的对唐诗的长期误解。

清人焦循说:“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②认为唐代的律诗为“一代之胜”。王国维在首肯焦氏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为“具眼”^③的同时,重新审定了“一代之所胜”的文体序列:“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④王国维将唐诗视为“一代之文学”,与焦循一样是指律诗,而且还从学理上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也就是说,在唐前,包括古风、乐府、歌行在内的古体诗因为长期流行,“自成习套”,“敝”而无生机,唐

① 胡应麟:《诗数》外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② 焦循:《易余龠录》卷一五,《木犀轩丛书》本。

③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④ 同上,自序第1页。

代诗人无法用这些古体创作出“新意”来,所以改写律诗;律诗也因此成了“一代之所胜”。焦循、王国维的这一说法,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说法之一,甚至成了流行于社会知识人群的一个常识性的判断。暂且不论焦、王在提出这一说法时的当下意义是什么,它是否合乎整个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历史,就唐代而言,各种样式的古体诗不仅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而且取得了杰出成就,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初唐四杰”在诗坛地位的取得,离不开古体诗;创作真正是“唐音”的陈子昂,他所运用的诗体几乎都是古体;最能代表高适与岑参边塞诗艺术成就的,就是古体;倘若李白、杜甫失去了古体诗的创作,恐怕难以担当起“双子星座”的隆誉;元稹、白居易发起的所谓“新乐府运动”,其体裁也不是新诗体律绝。诚然,新的诗体律诗、绝句是在唐代兴起的,体现了唐代诗人在诗歌的体裁上不甘牛后的创新精神,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换言之,唐代诗人并没有独守律诗一端,而是众体兼备、众体兼长的,而且在不同的诗体创作中,均能出于冥心独造的艺术风貌。这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

第二节 唐诗繁荣的原因

明代唐诗学专家胡震亨认为唐诗繁荣的原因在于帝王的提倡,他说:“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缚于先程;玄宗材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浸广。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固宜于喁遍于群伦,爽籁袭于异代矣。”^①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学界的一种共识。《全唐诗》开卷就称颂唐太宗李世民“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嗣后的历代皇帝也无不重视诗歌创作,正如唐玄宗李隆基《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一诗的序言中所说:“故以式宴陈诗,上和下畅也。”不过,帝王提倡并亲自投身诗歌创作的行列,形成“上和下畅”的局面,仅仅是唐诗繁荣的一种外部原因。古今不少学者曾从更为广泛和深层的历史文化中,多方面地寻找唐诗繁荣的原因。择其要点,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谈丛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一、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

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赋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谈丛》也说：“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觴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咨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王嗣爽在《管天笔记》中又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精力，千奇百怪，何所不有。”这些说法都认为唐代政府采取以诗取士的开明措施，去网罗人才，不分门第，只要文人的诗写得好的，被考试官看中，就可以登第及仕。这就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写诗的热情，出现了“无人不工诗”的现象，因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其他朝代的诗所以不及唐代，就是因为没有实施以诗取士的国策。

一般说，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始于唐玄宗时代。诗赋是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要求考生做有关时事、政治、经国大计的策论试题的同时，还要写一首诗。诗的题目是统一的，叫做“省题诗”或“试帖诗”。做“省题诗”的，都是考进士的人。唐代科举的名目很多，其中明经与进士两科为常科。明经不做“省题诗”，身价也不高。据传，王孙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为延誉，由是声华藉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①从中不难看出明经出身的社会地位之低。进士出身则不然。在唐代，进士地位甚隆，进士出身的士人广为社会所尊重，甚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②因此，为了能考中进士，在唐代社会普遍形成了“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的风气^③。这里所说的“业”，就包括了作诗之“业”。

① 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引《剧谈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76页。

②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③ 沈既济：《词科论》，引自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五九《杂论中》，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974页。

唐代以诗取士,并不局限于“省题诗”,还包括“行卷”之诗。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之前,将自己写的诗编成卷册,送给主考官或有关官员审阅,以期引起他们的注意;为了加深主考官对自己的印象,过一段时间再投,这叫“温卷”。“行卷”的数量有多有少,少至几首,多至几十首、甚至几百首,其中也包括散文。对此,程千帆先生著有《唐代行卷与文学》一书,认为“省题诗”要受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所以好的作品不多,“行卷”之诗则可以较为自由地进行艺术构思与创造,锻炼士子的做诗能力,从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然而,对于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否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有害于诗歌的发展。明人薛应旗在《皇明百家诗序》中指出:“唐人以诗取士,作者辈出,风流习尚,大雅日漓,而艺林词客顾皆极口推尚,模拟诵法,尝自以为不及。盖七八百年于兹无有异议。直谓宋人无诗,元以来虽学唐,总不能得其肯綮,此其言若出一口,而于身心性情,世教民彝关系与否,置弗论也。呜呼!亦甚乎其惑,且诞也久矣。”^①顾炎武则认为:“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②就个案而言,李白一生耻于科举,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科举考试,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诗歌艺术成就,成了唐代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不多的伟大诗人之一。把以诗赋取士的国策视为唐诗繁荣的唯一原因,固然失诸偏颇,但正如《全唐诗序》所说的那样:“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以诗赋取士之举,促使士人去深入钻研诗歌的艺术技巧,加强诗歌创作的基本训练,以期出奇制胜,一举登第,因而它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及艺术经验的积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失为唐诗繁荣的原因之一。

二、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

唐代虽然施行家天下集权制度,但相对来说,其政治环境是比较清明的,最高统治者能广开言路,从善如流,较少忌讳。这对打破思想禁区,开拓题材领域,使诗人们直抒己见,放言无忌,从而促进诗歌的繁荣,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集权政治始终制约着它的思想文化,但

^① 《皇明百家诗序》,引自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一六《著述》,《四库全书》本。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诗题》,《四部备要》本。

各个不同朝代的帝王所实施的具体政策,却可以使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不尽相同。如果有较为清明的政治环境,允许人们畅所欲言,秉笔直书,政治文化必然出现活跃的局面,并臻于繁荣。反之,如果政治昏暗,文网恢恢,禁区重重,士人动辄得罪,那么与之俱来的必然是政治文化领域的萧条冷落。在这方面,唐王朝的统治者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唐太宗更是其中的楷模。他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首开一代纳谏之风。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条,唐太宗“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太宗所说的“事有得失,毋惜尽言”,就是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又据《新唐书》卷二〇一《骆宾王传》:“徐敬业乱,署宾王为府属。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这也许是武则天故作姿态,但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臣僚和士人的顾虑,使他们不惮进言。后来唐朝的历代皇帝也大多具有这种容言纳谏的胸怀,这对诗歌创作是功德无量的。因为既然能放言政治而无禁区,也就不存在诗歌在创作题材与主题上的禁忌,诗人就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题材,提炼主题,做到“推见至隐”,鲜有避讳。这是诗歌繁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前人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便指出: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官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坂》、《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

本来,《唐律》第十“指斥乘舆”条规定:“诸指斥乘舆,情理切言者斩,非且言者徒二年。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绞。”但在唐代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诗人因“指斥乘舆”而被处死的事件。既然“直刺至尊”而不致获罪,那么指斥权贵、抨击时弊就更无被斩的危险了。白居易说他的讽谕诗使“执政柄者扼

腕”、“握军要者切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①。但他本人不仅无首级之虞,而且晚年还生活得非常优游,又得到了唐代第16代皇帝宣宗李忱深切怀念。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中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环境,广泛而深入地揭露社会矛盾的诗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诗人可以公开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和“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白居易《伤唐衢二首》其二)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计残年”(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种正言直谏的精神是唐太宗以来长期保持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传统所鼓励和培养的。杜甫《别李义》说:“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正是歌颂这一优良传统。当然,在唐代帝王中不乏昏庸者,但从总体上看,却较为恢弘大度。这种恢弘大度,则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中说:“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正因为国力的强盛,李唐统治者才敢于鼓励臣僚批评自己,朝野内外才能形成清明、自由的政治气氛;而这种清明与自由的政治气氛,为唐诗的繁荣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三、较为开放的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唐王朝实行的是儒、道、释三教并存的思想体系,而不像汉武帝时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从根本意义上说,唐代统治者容许这三教并存,是为了加强思想影响,巩固其统治,即“会三归一”,皆为其用。但在客观上,这对解放思想、活跃空气,促使诗歌的繁荣无疑是有益的。

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在唐代受到了高度重视。高祖武德二年(619),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太宗贞观四年(630),又令州学皆建孔子庙;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谥孔子为文宣王。唐太宗曾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系统地阐释了儒家思想,并作为全国学校教学和科举的教科书。但与此同时,李唐统治者又认道家始祖老子为本家,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把《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定为士子的必读书,使儒、道得以盛行。对于佛教,李唐统治者也同样大力予以提倡,先后派遣名僧玄奘、义净等赴天竺取经,将大量的佛

^① 《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四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2—963页。